

WENXUE
PINGLUN
CONGKAN

17

文学评论丛刊

现代文学专号

现代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七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七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 印张 344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39 定价: 1.65元

目 录

论郭沫若的诗……………陆耀东（ 1 ）

“献给现实的蟠桃”……………高国平（ 37 ）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思想意义

论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田本相 杨景辉（ 70 ）

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殷 鼎（ 100 ）

一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思想历程……………李存光（ 159 ）

——论巴金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杨 义（ 184 ）

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许子东（ 224 ）

——郁达夫新论之四

尼采与鲁迅前期思想	王富仁 (260)
关于《野草》的思想倾向问题	张福高 (288)
论《动摇》的历史真实	孙中田 张立国 (297)
论《围城》	郭志刚 (310)
“我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辛宪锡 (330)
——孙犁小说探索之一	
何其芳散论	章子仲 (346)
试论王统照小说的思想倾向	徐学俭 (374)
论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间的“问题 小说”	金宏达 (394)
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	朱德发 (411)
论李大钊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姚春树 (442)
关于蒋光慈赴苏留学时间	马德俊 (471)

论 郭 沫 若 的 诗

陆 耀 东

在中国新诗天际的灿烂群星中，郭沫若是最明亮的一颗。“五四”时代，他真是一代天骄，诗坛泰斗；“五四”后，他虽然象曾攀登过珠穆朗玛峰顶的登山英雄，力渐不逮当年，然雄心不已，创作热情历久不衰。这里，我想着重探讨郭沫若同志能成为诗界巨人的原因；郭诗（主要是《女神》）为新诗提供了那些为同时代人所不曾提供过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以及郭诗给我们的启示。

—

要是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点主观感情，他是不配称为诗人的；只有当他能够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时候，他才
是个诗人。①

——歌德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师别林斯基说：“诗人首先是一个
人，其次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民族和时

① 转摘自《外国名作家传》（上）3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代的精神影响，不能比对别人影响得少些。”^① 这里，揭示了诗歌作者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诗人自然是有个性的人，同时，又应和时代、祖国、民族和人民共同着生命和脉搏，至少在思想感情上相通。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诗坛巨人，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时代；个人的生活道路；个性（包括天资或者说天才，审美情趣等）等。把问题简单化或神秘化，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这三个方面，时代是最重要的，但后两个方面也不可忽视。

郭沫若在本世纪初叶开始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一九一四年赴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政治思潮，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斯宾诺莎、尼采、泰戈尔、歌德、托尔斯泰、列宁，以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王阳明等人著作的影响。其中，革命民主主义和泛神论，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

郭沫若同志亲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积蓄的愤懑，他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反对旧偶像的泛神论思想，就象是火药；伟大的五四运动，如同是点燃这火药并使诗创作灵感爆发的烈火。据诗人自己说：

……在民八、民九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

《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

①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西瓜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

在民八、九之交，那种发作时时来袭击我。一来袭击，我便和扶着乩笔的人一样，写起诗来。有时连写也写不赢。但这种发作期不久也就消失了。①

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创作灵感的爆发期，原因不是单一的，其中，时代的原因是决定性的。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女神》，这是无须赘述的；不过，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因为诗人郭沫若这时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了“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郭沫若所接受的种种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女神》②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泛神论几乎贯穿所有诗作。《晨安》、《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有着广义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棠棣之花》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凤凰涅槃》、《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中，或多或少有着尼采的影响。

我认为，郭沫若同志“五四”前后所接受的种种思想，大都有助于他“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有助于他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这里，我不拟一一加以论述，仅就尼采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诗作影响的积极方面，作一点说明。人们当可借一斑而窥

① 《沫若文集》第11卷，《我的作诗的经过》。

② 《女神》泰东图书局1921年8月版，本文所引和所论郭沫若的诗，均据初版本。

全豹。

大家知道，在“五四”前后，郭沫若吸收中外思想营养，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种立场出发，或者说按照一种需要去择取的，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需要。他往往是来不及进行仔细的考察，不一定能进行科学的鉴别，就将那些适合自己口味同时适合斗争需要的东西“拿来”。茅盾在一九二〇写的《尼采的学说》中，说出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方法，他说：“总而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学说，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改良生活，求得真理的，所以介绍尽管介绍，却不可当他们是神圣不可动的；我们尽管挑起些合用的东西来用，把不合理的丢了，甚至于忘却，也不妨。因为学说本来是工具”。^①郭沫若曾翻译过《查拉图司屈拉》的一部分，他说：“我译尼采，便是我对于他的一种解释”；“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象”。他指出：“尼采的性格是有一种天才崇拜癖的人，爱以一己的理想输入于个体之中，以满足其崇拜的欲望”；尼采是因失望于人类而著述。^②在《匪徒颂》中，郭沫若肯定尼采“倡导超人哲学”，敢于“欺神灭像”。在《论中德文化书》中，他将尼采与中国的老子作了比较，说：“老子与尼采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的发展。”^③这里不仅透露了郭沫若同志当时所理解的“尼采的思想，或者《查拉图司屈拉》全书的真谛”，也表明，郭从尼采那里，主要是取用了“欺神灭象”，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发展这些方面。而这些方面用于“五四”时的反

① 《尼采的学说》，载《学生杂志》7卷1号至4号。

② 《雅言与自力》，《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1月4版。

③ 《文艺论集·论中德文化书》。

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中，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勇猛的大无畏精神，尼采文章的磅礴的宏大的气势，狂傲而又不乏深沉的风格，对郭沫若同志更具有吸引力。尼采自称“发着凌越千古的大声”^①，并说他的苏鲁支“梦到立于天之涯，海之角，——地球之外面，手持天秤，称量这世界”^②。这些对郭诗，也大有助益。《天狗》一诗，就足以说明问题，这首以泛神论为精神支柱的诗，明显地有着尼采风。

我这不是说，尼采思想，代表着“五四”思潮，而是说，诗人从尼采那里采取了合乎“五四”精神的东西，从而使诗人能更好地“驾驭时代”，更充分地“表达时代”。

郭沫若接受泛神论，也是这样。他不是照搬斯宾诺莎的整个思想，而是取其核心，即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自然界是自身的原因，我就是神，否定旧的一切偶像，反对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东西。这也是合乎“五四”精神的。

许多事实表明：时代精神、时代思潮，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诗人心灵涡轮发电机的叶片，因而产生了异常惊人的热能，爆发出无穷的艺术创造力。

但是，如果我们只考察到时代原因就止步，那就还有一半路程未走，也就无法回答：“五四”时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诗人不少，为什么其他诗人的作品，不及《女神》的时代精神那么充分，那样汹涌澎湃？因此，我们还必须从郭沫若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方面进行探索。

郭沫若同志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嘉定沙湾的一个颇富

① 《尼采自传·序言》，梵澄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4月版。

② 《苏鲁支语录》132页，梵澄译，生活书店1936年9月版。

的家庭，排行第八。他的故乡，是具有反抗精神和义气的“土匪”聚居地。有的“土匪”还给少年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郭在家塾里受过残酷的封建“教刑”，这对他的叛逆性格的萌芽、成长、起了催化作用。稍后，在小学和中学，他又多次被卷入学潮，几次被学校处分、“斥退”，特别是刚进入青年时代，那使他极为反感和造成他莫大痛苦的封建婚姻，更激发了他对旧礼教的痛恨。出国前，从耳闻目睹中，他早已感觉到帝国主义魔影的威压；到日本后，他作为一个弱国的学生，在那儿经常受到歧视、屈辱和迫害。反帝爱国激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切，不仅促进了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也成了他的诗创作灵感冲动的热能，为他的感情的火山爆发作了准备。

有助于郭沫若“表达时代”的，还有他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下列几点，尤为重要。

（一）轻摹写，重创造。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作自然的老子！”^①这显然是对达·芬奇说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儿子，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观点的修正。郭又说：“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前者是纯感官的接受，经脑精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现出来，就比如照像的一样。后者是由无数的感官的材料，储积在脑精中，更经过一道滤过作用，酝酿作用，综合地表现了出来，就比如蜜蜂采取无数的花汁酿成蜂蜜的一样。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应得是属于后的一种。”^②这样，他写诗就不拘泥于对现实的照相式的反映，而能放笔挥洒，抒发自己的感受。

① 《文艺论集·自然与艺术》。

②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二) 着意于表现理想，着意于宣泄反抗的精神。他说：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巨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惟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①他认为：“文学是反抗精神底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②；“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③这与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泛神论，尼采的反偶像、“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思想相结合，就成了《凤凰涅槃》、《天狗》、《匪徒颂》这些不朽诗作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母亲。

(三) 主张抒写自我，“自然流露”。他的抒写自我，并非反对写社会，而是认为，“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不必定要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④实际上就是主张通过抒写自我，达到表现社会的目的。这对那些与社会与时代隔膜的作家来说，无法实现；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恰恰合适。虽然不能说郭沫若的个人苦闷，与整个社会及全人类的苦闷完全一样，但确实可以“反射出”社会和全人类的苦闷。

郭沫若对诗创作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接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⑤又

① 《文艺论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

② 《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③ 《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④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⑤ 《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版。

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①；“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②他甚至还极而言之说：“文艺的创作比如在作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唯心的活动。创作家要有极丰富的生活，并且要能办到忘我忘物的境地时，才能做得好梦来。”^③这些主张，未必很科学，但对于抒情诗来说，尤其是对在“五四”时能收时代风云于胸中的郭沫若来说，有利无弊。当时，他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感情，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呼唤，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理想，反对束缚个性、要求爱情自由的叫声，以及他那狂放不羁的性格，都与时代精神合拍。这样，他的抒写自我、“自然流露”的主张，就便于他无顾忌地表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便于充分地表现抒情主人公的个性，同时，又便于最充分地表现时代精神。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精神，在那时的诗人郭沫若身上，并没有什么矛盾。

郭沫若能写出《女神》这样不朽的诗，和他的独特个性也不无关系。一个诗人身上的个性和共性，难以机械地分开，前面我们谈及的许多地方，就有他的个性在。这里，为了探讨常为我们所忽视的诗人个性在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再花一点笔墨。郭沫若天资过人，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又极易冲动，富浪漫情调，性格外向，赤子之心往往直露。他说过：“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

①② 《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版。

③ 《文艺论集·批评与梦》。

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Impulsivist，……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一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①这是他的个性上的特点，也是他的《女神》抒情主人公的特色。在《女神》中，既有象地震一样轰鸣的作品，也有恬静的篇章。前者的价值远远超过后者。可以说，作为诗人郭沫若，最可贵的，还是他的感情的冲动性。

我们如果将郭沫若与鲁迅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许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个性的不同，天资的特长，对创作的影响。鲁迅长于观察，长于理论分析，生活态度严峻而感情深沉，他在小说、杂文和理论方面，树立了丰碑；郭在文学上成就最大的是诗，其次是历史剧。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郭沫若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

《女神》的出现，是主客观诸种因素的结晶。在诸多因素中，有的占着较大的比重，有的比重小些。但缺少任何一个因素，或者说，任何一个因素在性质上或分量上有所变异的话，那么，《女神》就会是另一番模样。我觉得，我们不能也不应否认创作冲动、创作灵感的存在和作用，问题是在于科学地说明它。《女神》中的一些最杰出的诗章，诗人几乎都是在激动得近乎发狂的情况下创作的。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一般地从生活，思想感情、艺术技巧来谈，就难以回答郭沫若同志诗歌创作史中的这种现象：他在“五四”后，思想向前发展了，生活阅历更丰富了，艺术修养更高了，并且也经历了“五卅”、

①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大革命这样激动人心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他为什么写不出象《女神》似的诗？可见，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在起作用、在触引灵感的爆发。又如，郭沫若说，他的创作冲动的冷却和消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去德留学，继任者每每给郭以不公正的待遇，“有一次他把我的诗附在另一位诗人的诗后发表了，但那位诗人的诗却是我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呜咽》一诗的抄袭，仅仅改头换面地更换了一些字句。这件微细的事不知怎的就象当头淋了我一盆冷水。我以后便再没有为《学灯》写诗，更把那和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①一方面，必然性在起作用，因为“五四”热浪渐渐冷却了，他的创作热总会冷却的，也因为创作冲动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着，即使不遇到这一事件，或会因别的偶然事件而冷下去。另一方面又有偶然性在起作用，说明有创作灵感爆发的事实存在。

从上面这些简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之所以能写出《女神》，非决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某一两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因为他在“五四”前夕，就从各方面具备了用诗的形式“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二

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②

——艾略特

① 《沫若文集（十一）·我的作诗的经过》。

② 转录自《世界文学》1980年第1期，杨周翰《艾略特与文艺批评》。

郭沫若同志并不是最早写新诗的人。他最早发表的诗，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这时，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鲁迅、俞平伯、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都已发表过诗作了。但是，郭沫若同志“异军独起”，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诗人。

郭沫若的《女神》，其中最杰出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时代的肖子。在中国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诗歌史上，只有少数诗作能与之相比拟。郭沫若拥抱时代，孕育为诗的精魂，经巨笔挥就，遂成惊天动地之作。

时代精神在理论家的笔下，也许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出来。而在文艺作品中，则表现得极其丰富多彩。《女神》尤其是这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作品外，恐怕再没有比郭沫若的《女神》更能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了。

“五四”时，郭沫若虽然身居东瀛，但心在祖国。这场腾空而起的反帝爱国烈火，使原已白热化的诗人感情如同发生了爆炸，形成了一个诗创作的高潮。

二十年代的诗人，几乎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最优秀的爱国诗，当推郭沫若和闻一多。郭的《炉中煤》，无论就诗情、诗意、诗趣，内在律、外在律，确是一代绝唱。诗共四节，每节五行，每行字数在七至十一字之间，大体是隔行押韵。诗人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寄寓炉中煤向年青女郎求爱。诗的首尾两节略有变化，又收到首尾呼应、反复吟咏的效果。第二、三节煤叙自身的历史，原是栋梁之才，被埋地下，经久成了黑炭，巧妙地点出，正是“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诗最后写道：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诗的意境优美、完整。思念祖国的情热，象是煤在燃烧，象是思念心上的年青女郎，饱含着深沉热烈的诗情。作品副标题点明“眷念祖国的情绪”，诗中则字字写炉中煤，不作牵强之笔，有内蕴而不晦涩，明朗而不浅露。

郭的爱国诗，抒发的是高热度的感情，但感情表达方式，并不单调。如果说《炉中煤》是浓情，那么，在《棠棣之花》中，则是以慷慨激昂、英勇献身的悲壮方式表现的。聂绀弩为弟弟唱的送别歌，豪情压倒了生离死别时的悲伤：

去罢！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二弟呀！去罢！

《胜利的死》为爱尔兰独立军领袖马克司威尼牺牲而作，是一首高亢的赞歌。诗称颂这位爱国者的死，是“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诗人怀着崇敬，怀着愤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些诗，对于正在进行爱国斗争的勇士，是巨大的鼓舞。

《女神》的爱国主义，既是屈原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续，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新的内容。在这个诗集里，对祖